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灵魂的挣扎

● 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
王富仁／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 谢冕 副主编 李杨

灵魂的挣扎

● 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

王富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

LINGHUNDEZHENGZHA

王富仁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1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6 000 册

定价：7.30 元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相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瘕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字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目 录

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代自序）	1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10
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	37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	67
开放过程中的文化：从龚自珍到洋务派	91
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鲁迅与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之比较	113
从“兴业”到“立人”——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	138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	170
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鲁迅小说和茅盾小说的比较研究	201
经济的改革与伦理观念的改革——影片《野山》随想	277

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

(代自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先生共同提出来的。提出之后，便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这个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各种形式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及史论著作出版了，还有很多文章论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它已成了与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并行的并且有较大时间跨度的文学史概念。

文学史的分期正如文学作品的分类一样，本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它是依照掌握和研究者的方便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文学史的分期方式和文学作品的分类方式既经建立起来，它便使整体显示出了不同的面貌特征，这也正象儿童排的积木一样，还是那么几块木头，用不同方式排列起来，整体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建立，对中国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认为，首先注意到的应有以下几点：首先，它改变了中国近一百年文学特征的观念，使我们重新以新的特征概括中国近一百年来来的文学。在过去，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我们关于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其一是政治革命的标准，并且是“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标准。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术界，这样几个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念实际是这样的：什么是中国的新文学？中国的新文学就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文学。而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什么？它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发生和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时期，新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适应着这样一种历史状况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表面看来，在这种观念与在别的观念下所意指的文学还是同样的一些文学，还是指的鲁、郭、茅、巴、老、曹这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是《狂人日记》、《沉沦》、《子夜》、《小二黑结婚》这样一些文学作品，但它却在无形中确定了你评价和组织整个这时期文学作品的方式：只要你承认这时期的文学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起来的文学，你就必须承认，凡是与这样一个革命有着更大的适应性关系的文学便是更符合这时期文学的总趋势的文学，便是好的文学，而一切与这样一个革命不同或相抵牾的文学，便是不符合这时期文学的总趋势的文学，便是不好的文学。正是在这种评价方式和组织方式下，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有了等级上的差别，茅盾与沈从文的小说也有了优劣的划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也就有了自己特定的存在形式。其二是按语体形式划分新文学和旧文学，即凡是用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都是旧文学，凡是用现代白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都是新文学。而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则是以现代白话新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这样的划分，在其历史分期的明确性和语言形式的明确性，不易使人混淆新文学作品和旧文学作品的界限，但直至现在，它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还没有任何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标准划分作品的等级，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所谓艺术标准仍是一

般的、适用于一切艺术的标准，而如何才能标示中国白话新文学作品价值系列，我们几乎还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而上述政治标准则更有其明确性并显而易见有其独立性，即它不同于古代的标准，也不同于外国的标准，是这个时期所独有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在没有一个确定而统一的评价标准的时候，它都将只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不会具有自己特定的面貌特征。文学史尽管在观念上只是依其时序先后区分文学的，但它一刻也离不开文学批评的配合，没有一个确定而统一的评价标准，你就无法把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组织起来，因为任何文学史都不是历史上一切作品的平等排列和杂乱堆积。正是因为语体标准的这一根本弱点，使政治标准有了与它相结合的可能性，因为两者都有不自足性的弱点：仅仅政治革命的标准无法进入文学研究的系统中去，它必须取得一种文学性的品格；仅仅语体特征至少暂时还没有找到分析评价自己和组织自己的有效方式，需要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标准衡量和组织自己。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这两种标准的结合，甚至我们大量的文学概念都只有在二者结合的需要中才能够理解。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等等，实际都是两个时间概念和两种社会现象结合而成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新文学发生于何时？我们的文学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它们都始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时。“五四”指的是何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它指的是1919年的5月4日，是指以这一天代表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为什么我们如许多的知识分子对这明显矛盾着的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知而不言呢？因为它是一种需要。从语体变革而言，1917年是一个时间界限，但仅仅这样一个界限，还无法导入我们必须使用的政治标准，还无法

具体评判这诸多新文学作品的价值，因而也无法将新文学构筑成一个由各种不同的价值等级组成的价值体系。“五四”则恰恰为输入这一标准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在这时，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传播，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提倡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并在“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已开展起来。依照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状况确立新文学的时代特征，恰恰能将新文学与评判它们的政治标准直接结合起来。但是，为什么又一定要把“五四”同新文学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仅仅以“五四”的时代特征确定新文学的标准，与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又会有较遥远的距离，不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狂人日记》无法被包括在新文学之中（它们都出现于1919年之前），而且象《阿Q正传》（鲁迅）、《尝试集》（胡适）、《终身大事》（胡适）、《沉沦》（郁达夫）等文学作品也无法被放在历史的首要地位来论述，因为仅仅从政治革命的标准而言，“五四”时期第一梯级的文学现象应是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关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它们才立于政治革命的最前列，胡适、鲁迅、郁达夫一类文学家至多只是第二层次上的文学现象，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至少在当时还是不自觉的。恰恰因为我们同时使用了语体变革的标准，他们才得以取得了十分显赫的主流地位。总之，我们将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和文学现象用一种浑融抽象的语词形式结合起来，只是我们的一种需要，不如此，我们在当时就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不难看出，我们过去的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概念，都是由这两个标准复合而成的。如革命文学（服务于政治革命斗争的用现代白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服务于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用现代白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为工农兵的文学(贯彻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的用现代白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资产阶级文学(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的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等等,都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指称意义。与以上两个标准同时使用的,还有第三个标准,即启蒙主义的标准,或曰反封建的标准,或曰文化革命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在以上两个标准的夹击下,向来是不固定的,也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政治标准的一种从属性的补充形式。特别是到了三、四十年代,它的第二位的从属性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说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是反封建的,其内在含义是什么呢?即是说他们的作品不是最进步的,但仍有其积极意义,在左、中、右的划分中,他们属“中”。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强化,使原本一个不稳固的联盟被破坏了,当它要十分严格地以自己的理论要求衡量中国近多半个世纪的文学时,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彻底否定了,而白话文的语体特征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等级系列,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又重新返回原始的混沌状态——当绝大多数的作品被否定掉之后,它同样无法构成一个有序的有机整体。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重又产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构架要求时,人们不难看到,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人的政治迫害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用原来的政治标准适宜不适宜描述中国近多半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的理论问题。矛盾即经暴露,就不可能再简单地返回原来的统一状态中去。但是,在这时,白话文的特征仍然处在无分析的浑融状态,它依然无法独立地取得组织整个这时期文学的资格。与此同时,启蒙主义的思想要求又恰恰是那时包括坚持改革路线的政治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它也就很自然

地从政治标准和语体标准的夹击中被独立出来，使其成了一个组织整个这时期文学现象的比较明确也比较统一的标准。向左，它可以把原来的政治标准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中重新消化；向右，它又可把语体变革放进自己的概念系统中来予以说明，所以它当时尽管也受到从左、右两个方面来的反对，但并没阻止它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标准。但是，当启蒙主义这个标准一旦被独立出来，原来的时限问题便变得松懈了下来，因为中国的启蒙主义既不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不始于1917年胡适发表《文化改良刍议》，而是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运动。这样的一个划分，恰恰又与国际上使用的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相吻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便产生了。它一经产生，便显示了它的超越性，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五四”文学革命是谁领导的问题的论争，原有的政治革命标准和语体变革的标准亦即1949和1917两个时间概念的对立使这一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一下子使人超脱了这种令人疲惫的理论问题的争论。总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本质内涵是以启蒙主义思想标准作为界定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近多半个世纪文学的根本标准，并以之作为组织中国变化了的文学的历史构架。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先生一开始便指出改造国民性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特质，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里并非是不是“都是”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标准衡量其价值的问题。

第二，它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其独立的把握方式。以前使用的两个基本标准，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上也会导致尖锐对立的两种理解。政治革命的标准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中国近多半个世纪的文学当作超前发展的文学，因为当世界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的

时候,中国的文学已经以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为主流了。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相继蜕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学的时候,我国文学也就极其自然地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超前发展的文学了。虽然那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否定了中国绝大多数作家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国有无文学也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个标准本身便能够自行派生这种观念,它是不必接受其它结论的检验的,正象我们既经虚构了凤凰这种禽鸟,就一定会同时产生凤凰蛋的观念一样。凤凰能不下蛋吗?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能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吗?但与此同时,诗体革命的标准又能产生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念:中国文学是初生的、严重滞后性的文学。胡适、蔡元培早就指出,中国的白话文改革相当于但丁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实现的文学语言的改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也相当于西方早在几个世纪以前早已完成了的文艺复兴。从这种比较中,我们所得出的观念是中国文学的严重滞后性的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恐怕仍然难以使我们有一个较统一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观念。就它的启蒙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本质内涵而言,它仍然使人感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滞后性,面对独立发展着的西方文学而言,它是被动的、受影响的一方。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却也提供了另一种看待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方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的直接对应性,使中国文学自然地具有两个互相联系的特征,它的开放性以及它与世界文学共时性发展的同步性。在这样一个概念中,仍然承认中外文学的差异性,但二者不论如何不同,都是彼此独立的、同时发展着的两种文学,它们都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文学现象,并且具有着共时性的同质联系。

第三,它把中国文学重新描绘成一个自然的、相对平稳的

发展过程。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三段论分段法，不但使中国文学史的讲授带有零碎性的弊病，同时还给人一个不断转折的印象，分类本身便说明我们把它们视为三种不同质的文学，使整个中国文学给人以非自然发展的不稳定感。特别是从1917或1919开始分段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它的反传统倾向更使人感到已与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在新文学中已经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分期的始发线前推到十九世纪末，不论从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哪个角度，它都是一个怀孕期（1917或1919更象一个生产期，有着剧裂的阵痛），新与旧在当时还处在同一个母体之中，这就把中国的新文学比较自然地与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起来，中国古典文学的母体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这里也具有基本均衡的关系。而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时期文学之间，它使人必须注目彼此的本质性联系，使其成为一个自然变化着的统一过程。我想，这一点将使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段历史越是成为历史，人们便越是需要更高的意义上把较长阶段的文学现象当作一种统一的现象来把握，而相对舍弃彼此的现象上的差异。文学的分期只会越来越趋于完整，不会越来越趋于零碎。

在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先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既未曾撰文支持，也未曾撰文反对，因为我更趋向于作家论和作品论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较少考虑。但我们都是同代人，在观念上相通的地方不少，所以在具体的作家论中，与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所含蕴的意义有不少相同的地方。现在承蒙时代文艺出版社同志的好意，将其编辑起来，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专著，但也可以看到我对二十

世纪文学的一些把握方式和具体看法。现在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会感到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治学上的局限性，但恐怕也会有现在的文学研究方法所不易接触到的问题，只要有一二读者在其中能得到一、二句话的启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3年6月21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